



公方彬◎著

著名学者·国防大学教授

瓶颈 中国

这些
瓶颈，
必须打破！

缺失的信仰
瓦解的精神
沦落的道德
苍白的思想
弱化的管理

 中国工人出版社

瓶颈中国

公方彬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瓶颈中国 / 公方彬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08-6304-5

I. ①瓶… II. ①公… III. ①社会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300161号

瓶颈中国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郭 铁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82916 (职工教育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996 (010) 82075964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童世平

公方彬是我在国防大学担任政委时由军事科学院调入国防大学的。2008 年年初的一天，许志功副校长对我说，公方彬有意到国防大学工作。我感到方彬是从事政治工作研究的难得的人才，调入国防大学无疑是对教研力量的加强，于是立即与喜斌校长沟通，明确表示欢迎，并要求干部部长找公方彬征求意见，尽快办。方彬调到国防大学后，很快适应新的岗位要求，融入学校的教研队伍，他的教学科研能力得到了学校上下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我离开国防大学后，方彬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丰硕教学科研成果，被确定为全军首批创新人才培养对象。按规定凡被确定的对象要有两名签约导师。因我曾任国防大学政委，我们彼此很熟，他就提出请我和亚洲政委当签约导师。亚洲政委是学者型领导，当导师名副其实，而我当导师则勉为其难了。但考虑到方彬正式提出，而且十分恳切真诚，我应允了，这样我们就建立起“师生关系”了。2012 年年初，方彬对我说，有两本书要出版，希望我和亚洲政委分别作序，我答应了。

与方彬相识已有 20 多年了。我在海军宣传部工作时，有一天，一个戴着尉官肩牌的青年军官到机关看我，并作了自我介绍，还送我他出版的著作，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尽管我知道公方彬同志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全军宣传的基层政治工作典型，是从研究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起步和成长的，但交谈后特别是翻阅了他的著作，我感到这是一位勤于研读、思想敏锐、活跃，知识功底厚实、善于探索思考的年轻人。有一次我应邀参加总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修改座谈会，短暂的休息时间，作为课题组成员的方彬热情与我交谈，了解部队情况，并对他关注和研

究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进一步增强了我对他的良好印象。后来在我任南海舰队政委期间，舰队请他作政工条例学习辅导，那一天恰好是海军舰艇编队首次访港归来，机关安排我和司令员到码头迎接，听课出现了时间上的冲突。为此我让机关的同志预告方彬，课间我和司令员可能要提前退场，后因舰艇编队靠码头时间推迟，我和司令把课听完。这一次，方彬的理论水平、思维层次和授课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讲课辅导的最大特点是注重贴近实际，勇于正视热点、难点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确能起到破解难题，释疑解惑的作用。

方彬告诉我，调入国防大学后，主要忙于课堂授课，已有几年没有出书了，目前积累了几百万字的书稿，准备陆续整理出版，《觉悟中国——当今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是计划中的第一本。翻阅书稿方知，这是一本围绕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主要以答问形式阐述的著作。作者先期出版这本集子，是个好的选择。道德问题是当前社会上下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理论界、学术界重点研究、争论颇多的问题。方彬把自己对这个问题多年研究的成果展现在社会公众面前，其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就很大了。我还想特别指出的是，方彬在道德问题研究上有很强的自信和说服力。这不仅因为他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很深的理论积淀，还因为他自己就是言行一致，堪称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践行者，做了许多人不易做到的事：多年来资助贫困学生读书，拿出120万元的稿费、讲课费和工资资助623名学生读书，这些受资助的学生中有343名考上了大学……这些数字中反映出他拥有源自灵魂的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对道德理论的深入探寻和思考，从而增强引导力、感染力、说服力。这就是为什么方彬到中央国家机关、大学、部队作报告上千场，直接听众百万人次，也作过许多电视报告、网络视频演讲，谈及道德问题总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让人触摸到真诚、真情、真挚的内在原因。凡是研究精神或道德领域的著作，凡是真正出自作者心灵深处的呼唤和情感，就会给读者带来同频共振，产生持久的生命力。

方彬的研究领域比较宽，《觉悟中国——当今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涉及的内容只是其关注和研究内容的一部分，从中已经展现出其观察的视角和研究的特点。近些年来，方彬向中央和军委总部提交了80多项内

参与研究报告，就我在总政和国防大学工作期间就看到其研究报告和建议有五六十项，这些建议往往能给人启发和思考，其中不少建议被采纳，进入决策。比如在本书中一再提及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军人核心价值观，就是他长达十年研究的重要成果，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下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大命题。这也反映了方彬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和思考的敏锐性、前瞻性。此外，他还参加北京精神的提炼与宣传，与中科院院士怀进鹏、文化学者于丹、阎崇年一起在北京精神发布现场作的解读也受到好评。仅就本书所研究的内容看，许多见解和分析有独到之处，比如，农业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伦理道德在进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后遇到的不适应，传统的“五伦”道德与西方“六伦”道德的差异和根源，私德与公德问题，宗教支撑的道德与政治信仰支撑的道德的差异与走向等，都能引发人们深入的思考。本书采用问答的方式进行阐述，更适用于与读者的交流。

我衷心希望方彬能在积极研究探索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更多富有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希望这部作品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注：本序作者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海军上将。

目 录

一 突破道德瓶颈——重塑社会规范

1

道德观察

- 中华民族的道德特点 \ 2
- 无需回报的道德 \ 4
- 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 6
- 中国官员的品德问题 \ 9
- 守住最起码的道德底线 \ 11
- 每个人都要有强烈的遵纪守法意识 \ 12

原因分析

- 道德的本质和动因是什么? \ 14
- 多元价值观更需树立道德核心 \ 16
- 寻找中国道德的根本 \ 18
- 老人“妖魔化”原因分析 \ 20
- 官员诚信缺失拉低道德水平 \ 22
- 集体失德的背后成因 \ 24

解决途径

- 道德和法律,一个都不能少 \ 26
- 如何提升道德修养? \ 28
- 理想信念应以品德修养作基础 \ 29
- 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 \ 31
- 中国需要道德重建 \ 34

二 突破价值瓶颈——树立共同追求

37

价值观察

- 当前面临的价值挑战 \ 38
- 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 40

中国婚姻暴露的价值混乱 \	43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 \	44
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价值 \	46
价值标准不能乱 \	47
中国，请你走得慢一点 \	48
舌尖上的动物大迁徙 \	51

原因分析

当代中国的清晰价值坐标 \	53
建立追求真理的价值标准 \	56
官员要真正树立起公仆意识 \	57
当代中国需要英雄气 \	58
从纳税看价值追求 \	60
中国走向世界需要价值追求的提升 \	62

解决途径

建立与世界同步的价值追求 \	65
以时代高度牵引价值追求 \	67
不可剥夺的信仰和信念 \	70
寻找丢失的信仰 \	72
核心价值观——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 \	74
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精神的内在支持 \	75
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核心 \	77
核心价值体系代表着我们的精神追求 \	79

三 突破精神瓶颈——化解懈怠之气

83

精神观察

中国梦引领中国精神 \	84
体现中国精神的英雄 \	85
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利益观 \	87
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 \	89
如何看待当前的集体焦虑? \	91
财富分配引导精神追求 \	93
正视历史重塑精神 \	9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	98
团结互助使社会更富人情味 \	99
节俭与艰苦奋斗永远不会过时 \	101

原因分析

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精神懈怠? \	103
精神缺失是中国前行的羁绊 \	104
在新权威的确立中获得精神归依 \	106
中华民族的精神元素与挑战 \	107
中国精神的蜕变和成长 \	111
缺乏创新精神的文化原因 \	113
缺乏创新精神的现实原因 \	115
限制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 \	117
“勤劳”员工“不敬业” \	119

解决途径

我们的精神权威在哪里? \	123
精神兴衰周期律 \	125
治党要从价值追求抓起 \	127
追寻我们的精神起点和归宿 \	129
探寻精神出路 \	131
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	133
民族复兴需要更宽广的胸怀 \	134
政府 in 提高创新能力中的导向作用 \	136

四 突破思想瓶颈——给思想一点空间

139

理论观察

中国需要更多真正意义上的专家 \	140
崛起中国呼唤思想英雄 \	141
为什么要建设文化强国? \	144
思想家是突破中国崛起瓶颈的钥匙 \	145

原因分析

当前文化创新的现状和困境 \	147
大战略源于大思想 \	149

解决途径

- 社会有多宽容，思想就有多远 \ 152
- 走出困境的路径和着力点 \ 154
- 建设思想家的摇篮 \ 156
- 造就大批思想家的突破口在哪里 \ 158

五 突破管理瓶颈——建立制度约束与道德自律

161

管理观察

- 中国公共管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 \ 162
- 公正、公平的社会意义 \ 163
- 低诚信导致高成本 \ 164
- 盲目决策造成经济增长负担 \ 166
- 媒体宣传失真反映的观念误区 \ 167

原因分析

- 人们为何不愿讲真话？ \ 169
- 消除腐败的根本出路 \ 170
- 当前社会矛盾突出的深层原因 \ 172
- 如何看待前进道路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 174

解决途径

- 领导干部如何改善作风？ \ 178
- 机制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哪些影响？ \ 180
- 社会管理需要监督和约束机制 \ 182
- 靠制度也要靠道德 \ 183
- 全民免费医疗到了该实现突破的时候 \ 185
- 征收遗产税对老百姓有利 \ 187
- 全球网络博弈中的国家意识与个人理性 \ 189
- 如何管理虚拟世界？ \ 191

P
I
N
G
J
I
N
G
Z
H
O
N
G
G
U
O

—

突破道德瓶颈

——
重塑社会规范

【道德观察】

中华民族的道德特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道德的民族，道德教化几乎与民族文字有着一样漫长的历史。特别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德更是上升到经世治国的高度，比如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认定“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甚至中央官僚机构所设六部，一直是将礼部置于兵部、刑部、工部之前，足显礼仪道德之重要。

中华民族重道德的特点，在与西方社会作出比较后更加清楚。以大学的校训为例，重道德和求真理是中国与西方的主要区别。先看中国大学的校训：清华大学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北京师范大学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东南大学是“止于至善”，扬州大学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再看西方大学的校训：美国哈佛大学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耶鲁大学是“光明、真理”，斯坦福大学是“自由之风飘荡”，堪萨斯州立大学是“谨守大自然的法则”，柏林自由大学是“真理、正义、自由”……

那么，重道德是否收获了道德？现实似乎并不乐观。有位大学教授

在给大学生作报告时，提出一个问题：“当今社会缺什么？”学生齐声回答：“缺德！”当今，道德不彰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但这一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几十年前，国学大师胡适先生就讲过，中国人存在三大毛病：缺少爱心、恻隐之心，不能见义勇为，贪生怕死。为什么道德讲了几千年，仍然难以形成普遍的道德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儒家文化在倡导道德的同时也在抑制和扭曲着道德。

第一，儒家文化所维护的等级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抑制道德生长的制度。道德赖以产生和存续的基础是人与人的平等，没有平等便不存在人格尊严，进而不会产生维护道德的冲动。没有了内在的驱动力，道德成长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儒家文化最重要的特质是强调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汉武帝在嵩山制造了“山呼万岁”的神话后，整个民族便跪下了，一次次下跪，一次次强化，终于成了仰视权威的顺民。没有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也不可能存在对道德的珍惜和追求。

第二，儒家文化所强调的道德是一种有限的道德，同时因取向有失偏颇而使道德存在缺陷。中国封建时期所推行的道德，很难认定为普世的道德，亦很难说是一种能够满足人灵魂需要、提供精神归宿的道德，因为确立道德的目的仅仅是维护封建统治。既然是以帝王需要为道德标准，便不会产生博爱。没有博爱，道德张扬的空间必然变得很狭小。梁启超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时就说过，中国人“无高尚之目的”。没有高尚的目的，难免会堕入庸俗化和功利化。为什么我们习惯于法外求法，不遵守规矩，并且形成了严重的贿赂心理、灰暗心理？原因即在于此。

此外，在道德取向上，儒家文化更突出的是私德，对公德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私德包括勤奋、俭约、孝敬等，公德则包括爱人、互助、宽容、守信等。以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的名剧《窦娥冤》为例，窦娥临死之前发了三个愿：“血飞白练，六月雪天，楚州亢旱。”她希望通过大旱饿死成千上万的人震惊皇上给她申冤，但她又很关心家人，要求上刑场之时绕道走，避免婆婆看到会伤心。人们都为窦娥所感动，认定其所作所为符合道德。这种价值判断，显然是默认了“为成就私德而牺牲公德”。

第三，儒家文化在推行道德过程中未能调动大众进行灵魂深处的自

我救赎。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的哲学，这决定了其推行和强调的道德是“标签式”道德。推行过程中强调借助皇权的力量，因此这种道德只能是“力量的道德”而“非道德的力量”。

既然不是由灵魂深处迸发并外显的道德，一旦推行道德的力量弱化，或者朝代更替、社会转型，就可能使原有的道德弱化，甚至紊乱。这一点与西方的道德实现有着很大的区别。西方文明有两个基本源头，一个是古希腊文明，另一个是基督教文明。科学解决的是真，宗教解决的是善，艺术解决的是美。这都告诉我们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道德实现必须从人的灵魂深处产生，追求人性的自觉，强调人自灵魂深处产生怜悯和博爱。这种不加强制的自我发现和张扬的过程，才能使道德维持长久。

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环境下，仅仅试图从传统国学中寻求道德力量和出路，以实现一个民族道德的觉醒，希望以此最终站立于人类道德的制高点，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无需回报的道德

古人说“上善若水”，成熟的道德“行为无痕，作用有形”。以捐助为例，道德并不一定反映在助人者与受助者的直接对接上。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资助了谁，自己的善行都会产生作用，注定会作用到最需要的人那里，给他们以生活上的帮助和心灵上的抚慰。而这种助人行为不应该，也不能走向契约关系，因为契约关系更多体现的是法的内涵，而不是道德的感动和力量。

道德和法是两个范畴的概念。道德属于善与美的范畴，而法则是道德的底线，道德不足以约束人的行为之时，人们才会诉之于法。虽然我们简单地认定道德契约已经进入法的范畴，但它至少属于道德的异化，属于道德标准的堕落。

现代慈善的最大特征之一，便是显现于中华民族传统“五伦”之外的“第六伦”，即陌生人间的伦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如孟子所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说，父子之间要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要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挚爱兼内外有别，老少之间要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要有诚信之德。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人伦关系和处世之道的基础。这种伦理道德形成于农业经济，同时与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从农业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由固定区域的生活发展为现在的自由迁徙，由熟人之间交往发展为快节奏的陌生人之间的交往。这种情况下，再在“五伦”之间求道德，显然与时代和社会特征不相符，也很难引领一个民族走向人类道德和文明的制高点。

只有当一个人不管外界如何评价或置疑，仍一如既往地行善，才敢言道德实践真正源自人性和信仰信念，才敢言道德的成熟。唯此，道德行为才会普及化、平民化、常态化。如果过于看重受助者的感激之情，那就不是人性之光的驱使，也往往难以让施助者和受助者产生心灵的净化和感动。

在美国，每年来自捐款人的上千亿美元善款，绝大多数不是“点对点”式地直接作用于受助者，而是通过基金会来实施。因为施助者对受助者有意或无意的感恩期待，不仅会扭曲、异化道德行为，更有可能泯灭人们原本的道德理念。如果过于反复强化“你行善，我感恩”的道德价值观，无疑等同于告诉人们：予我有恩者必有回报，未予我帮助者，我亦无援手之责任。

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对等模式，具有浓厚的商业交往特征，很难把爱和道德推广延伸开来，很难将道德形成一种人性的自觉，更难以形成普遍存在于大众中的价值取向。即使已经处于行善行动中的人，其热情也往往因时、因事、因环境氛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行为得到社会褒奖，受助者感激，捐助者则热情倍增。一旦心理预期得不到满足，失落感陡生，没有外在鼓励和刺激，帮助他人的内在力量又较弱小时，就很容易终止道德行为。

建立于利害关系之上的善，必定难以持久，难以社会化、公共化。我们社会长期进行着道德教化，效果却并不理想，不能不说与道德行为的功利化、符号化有关。人们的道德行为不是建立于灵魂深处的怜悯之上，而是过于强调受助者的回报，虽然初衷是张扬道德，但实际结果却有可能混乱了道德的动机，抑制了道德行为。

反对让受助者背上道德的压力，并非反对社会互助行为在受助者身上产生塑造作用，更不是反对将道德行为发扬光大，而是认为这种作用要依照规律进行。有人施予善行并有回报的期待无可厚非，但这不是道德行为本有的品质和特征。只有真正从人性的层面激发出善，而不是附加一系列概念和符号时，一种社会普遍的互助意识和行为，一种大众共同构建的和谐与美好才会真正形成。

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每当新生入学，有关贫困学生的两个话题往往不期而至：一是为贫困生呼吁救助；二是批评受助学生缺少感恩意识。

学生上不起学，年年讲，讲年年。但似乎总不能把问题解决好，这已经属于体制机制的问题了。至于反复向受助学生灌输感恩于帮助者，则有必要作出辨析。

某报曾刊出一篇题为《受助学子为何难说“谢”》的文章。其中讲到一家媒体组织了捐资助学活动，帮助 1000 多名学生顺利地走进大学校园。但几年下来，这些学生没有一人通过电话或书信与捐助者直接联系，也没有人通过媒体向捐款人士表达感谢之情。该文作者据此认定，“一些学生的心理和思想健康状况令人担忧”。类似的担忧或批评屡屡见诸媒体，比如前几年曾有一位天津老人资助数十名学生读书，老人遇到困难时却没有无人问候和帮助。这不能不迫使我们思考：助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帮助别人？

其实，社会大众的助学原本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一种人性的自然反应，是一种自我修养和心灵净化的方式。对于绝大多数平常人来说，彻底的和纯粹的奉献是没有的，所有的奉献都是为了得到——有人奉献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奖励，有人奉献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精神回报。

不能不承认，我们在社会互助问题上赋予了过多的附加意义，反而忽视了其中蕴含的人性之光。于是，很多人每做一点有益于他人或社会的事情时，都要事先做很多的思想准备和行为准备。为什么人们把一个正常的行为看得那么重呢？一是因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重私德、轻公德的情况，即勤勉、好学、孝敬等私德做得比较好，而怜悯、互助、守信等公德却做得不够好。二是因为我们的道德陷入了误区，出现了道德问题非道德化，非道德问题道德化。比如，我们宣传了大量的售票员热情服务、项目经理不造豆腐渣工程、领导干部拒贿、商店不卖假货不短斤少两等行为。把这些人作为道德楷模来宣传，是不是把正常行为当作道德行为了呢？

价值判断分五个层次：弘扬的、要求的、允许的、抑制的和取缔的。首先我们不要把“要求的”当作“弘扬的”来对待，同时也不要过多地政治化。善行，本来属于人性的光辉，如果总是赋予其太多的政治意义，虽然目的是引导更多的人去做有益的事情，但实际的结果却是弱化了人们的天性冲动。比如，雷锋精神，既有政治理念，也有人性之光，但如果仅是解读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势必会给民众以误导。

什么才是道德的成熟？在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好事，而天天做好事时，就是道德的成熟。当前，人们对物质生活看得过重，导致了精神世界内涵不够丰富。个别先富起来的人社会形象不是太好，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没有真正弄清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不明白金钱对于人生的本质意义，因而缺乏担当精神和社会义务。

步步高总裁段永平曾经以 62.01 万美元（合 496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福布斯》网站报道说：“可能段（永平）真的很饿，他这顿饭要花去比去年多一倍的价钱。”段永平则这样解释自己花大价钱与巴菲特见面的理由：“我最想问巴菲特，‘如果你手里有很多钱，但没有好的投资目标，你会怎么办？’我想他能给出令我满意的答